

与不惑之间

BUQUN BU HUO ZHI JIAN

与经济学结缘20年

蔡昉 著

青 年 学 者 自 述 丛 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关于这本书的话／1
1·1著述与自述／3
1·2关于书名／7
1·3怎样写，写什么／10

第二章　走进经济学殿堂／17
2·1“ ’78”的含义／19
2·2寻找专业感觉／29
2·3“贬值”与升值／38

第三章　转轨的学问与学问的转轨／43
3·1范式转变中的选择／45
3·2“换羽”与激励／52
3·3学问规范：驶向何岸／56
3·4结论与过程／61

第四章　悟性哪里来／67
4·1经济学家的基本素质／69
4·2读书“不求甚解”／73
4·3“卖橘者言”／80
4·4保持一个开放型的思维／90

第五章　“穷人的经济学”／95
5·1被“锁定”的研究方向／97
5·2从小岗村到蒙德拉贡／101
5·3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113
5·4“藏弓”之作／123

第六章　“中国的奇迹”／129
6·1“三人行……”／131
6·2怎样解释“奇迹”／136
6·3反响与争论／153
6·4特殊的激励／158

第七章　“新潮初起”／165
7·1“漂浮”的依据／167
7·2为什么研究迁移／171
7·3“农村包围城市”／176
7·4为谁立言／183

第八章　“不务正业”的人口学家／193
8·1关注贫困／195
8·2树木与森林／201

8·3发展的人文维度／209
8·4从Abisko到IGBP／215

第九章　文缘与师缘／223
9·1山不在高／225
9·2谈笑有鸿儒／233
9·3好为人师与不耻下问／238

第十章　思考学问／247
10·1难得糊涂／249
10·2宁拙勿巧／254
10·3面对谁写作／258
10·4怎样规范自己／263

第一章

关于这本书的话

1·1

著述与自述

在打算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我花了不少的时间使自己搞清楚，要写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东西。不过，从一开头我就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部专著。

我不了解科学方法论中是怎样定义专著和规范专著的写法的，也没有试图到《辞海》里面去查询关于专著的解释。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和写专著的经验，一部专著是依照理论逻辑展开的。通常要从文献回顾起步，即看一看在本主题的研究上，前人究竟干了哪些工作，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也就是说写自己的著作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然后才能让自己和读者知道，你的假说到底与别人的有何不同，比前人有无前进或前进

了多少。

就经济学专著来说，提出假说之后，进行实证检验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要用实际经验检验自己的假说是否抽象得正确，即究竟是不是符合实际，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与实际相一致。拿我们的行话来说，这个检验过程最终是要取得实际与假说之间的一致性以及统计显著性。

把上述几个基本的过程走过来，势必要码起一定数量的文字和符号。如果这些文字和符号仅仅为数千字到三五万字，我们不把它称为专著，而只是论文或报告。假如我们有幸或不幸堆砌起数万字到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通常人们称之为专著。

学术专著当然反映的是作者的学术思想，但它归根结底还不是学术自述。如果仅仅把自己可以形成或已经形成的专著和文章中的学术思想，集中到一本小书里面来讲，它一定比任何一本专著或文章都更为沉闷。80年代以来，我除了做研究就是做研究，研究出结果来就要将其变为文字，于是有了若干本书、上百篇论文，学术探讨涉及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劳动力迁移等一系列适用于经济分析的领域。如果把这些东西浓缩在一本书中，我既怀疑自己的能力，也怀疑读者的耐心。

学术自述或许是把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研究过程统一到一起，让读者知道你是怎样做研究的。我和每一个从事研究的学者一样，经历过相对于自己的水平而言从低到有所

进步的过程。但是，这样颇有些像一本学者传记了。我不是名人，也谈不上是成功者，写一些个人经验之谈，启发年轻人的念头断断不能有。何况，讲一大堆专业的过程，对非专业的读者不啻一种灾难，何苦害人害己。

经过这种筛选过程，我开始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除去我写的文章和书之外，在我的研究中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告诉读者呢？或者说，写些什么才能做到于人于己都有所助益呢？

首先，我个人学习和从事研究的过程，恰好与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经济改革，以及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同步。一方面，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在时间上并行；另一方面，由于我从事的恰好是经济研究，又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与时代联系起来了。所以，在改革开放年代，设想读者都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关心中国的改革事业，所以，看一看在改革过程中，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怎样做出他的那个份额，也许能够引起一定的兴趣和共鸣。

其次，既然这些年出了一些研究成果，让读者了解这些成果是怎样做出来的，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不是那样的结论，也是一种宣传自己学术观点的方式。从不太重要的意义上说，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毕竟有得有失，何以有所得，何以有所失，终究是种经验之谈，尽管不敢说对别人有多少助益。

再次，从求学到成为某一领域的职业研究者，其间要

经历千辛万苦，要走过不知多少弯路。我本人一向胸无大志，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耽误的时间、丧失的机会尤其多。如果我把自己的求学过程作为一种成功（我是在绝对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经验，对青年学生也是会有所裨益的。我希望如此。

最后，在当今这个忙忙碌碌的时代，即使做学问的人也没有时间“吾日三省吾身”。寻找一个借口，创造一个机会，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总结自己的研究结果，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写这样一本书对自己也是有益的。于人于己皆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呢？！

关于书名

我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还出了几本书，但始终没有学会给自己的作品起个好名字。其实，岂止是不会给文章起名字，连人名都起不好。我自己的名字就没起好，每次出席会议组织者都要抱怨一番，说如何如何在电脑字库里找不到我的那个生僻的字。但那实在怪不得我，是父母给的见面礼，我这个人又比较传统，认为受之父母的东西不宜改变。但我们的下一代就不管这些了。我给女儿起的名字，无论是旁人还是她自己都认为拗口。我敢打赌，她获得自主权后一定会改名的。

一本书起了名字后，通常就没有机会修改了。我也知道书名起得好不好，对于能否吸引读

者至关重要，许多畅销书就是靠个好书名而卖了好价钱。可我仍然学不会起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但是，毕竟本书的内容不适于起一个诸如《关于什么什么问题的研究》这样的书名。最后，我有了这一个——《惑与不惑之间》外加副标题。

取意有三。其一，是个生理现象。只有人到中年的朋友，才能真正懂得我现时的感受。我本人过了四十岁刚刚两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够得上在不惑之年。而与经济学研究结缘，恰恰又是从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一半之时开始的。所以既有不惑，又有惑。既然是学术自述，从动态的角度讲，可以说是在经历从惑到不惑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算扣题。

其二，是寻找一个个人价值的参照系。我的学术生涯恰好与二十年前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同步。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目标渐趋明确，最后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也算是一个从惑到不惑的过程吧？时代是伟大的，个人固然渺小，然而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归根到底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立足时代的大背景，考察和反思个人的活法，十分重要。不然的话，面对商海狂潮而无动于衷，不仅别人以为你若不是无能便是有病，你自己难免都被自己弄糊涂了。所以，把渺小的自己与伟大的背景放在一起，从反差中认识自己的责任和选择，也可避免用“难得糊涂”这样的托辞自我解嘲。

其三，是取个自谦的意思。先从学问来说，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如此之迅速，相对于个人有限的生命和有限的智力而言，经济学的学问可谓博大精深，以致即使你投入全部身心，甚至搭上你的头发、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也仍然望尘莫及。就我自己的感受，越是努力工作和学习，越感到知识不够。当人们终于称你为经济学家时，你反倒发现，你不仅不可能在许多领域做到信息充分，就连自己侍弄的那块“自留地”，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在惑与不惑之间。

从人生经验来说，这个社会正处于一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型的时期，中国文化又经历过几番颠过来倒过去的黑白混淆，世事沧桑、人情冷暖已经成为一门至为高深的学问。即使借助于计算机和因特网，四十岁也远远不足以达到不惑的境界。难怪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定义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概念。所以，说处在“惑与不惑之间”，已经算高估自己了。

怎样写，写什么

1·3

据说爱因斯坦在选择闲谈对象时，先要问对方的智商。高智商的对手可以谈“相对论”等等，而一旦遇到低智商而又需要闲谈打发时间的话，通常就与对方谈论经济学。我猜想，这是经济学家编出来的故事，用以自嘲。可见经济学家至少承认，自己在旁人的眼里是很乏味的。有的经济学家干脆事先警告读者：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学问。

经济学论文的语言之枯燥、单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十年前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写文章、出风头犯了众怒，引起十几个同行聚会批评，并意欲写些商榷文章。当时这十几个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称得上是著名经济学家。十几年过去

了，在“著名”二字泛滥成灾以致贬值的今天，大概都或多或少称得上是著名经济学家了。可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竟无人愿意执笔迎战。原因之一便是，所要批评的对象即那篇理当批评的文章，文字颇为出色。如果不能出其右，恐难避免贻笑大方。说实在的，我当时也颇有些纳闷，与这位犯众怒的仁兄同寝室三年，竟未看出有此手笔。

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写了印出来，是要给非专业读者看的。如果我采用了惯用的手笔，一定要倒掉读者胃口的。然而，文字水平、写作风格却不是能够因地制宜的。这一点，算得上是我与所有打交道的编辑之间永恒的争议了。

为此，我的确煞费苦心了一阵子。后来我想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似乎获得了一点启发。1991年我随社会科学院一些同事到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参观。我记得，大家听禹作敏讲话时几次热烈鼓掌，以至使得这位见过世面的庄主颇为兴奋，竟破例请我们一行几十人吃饭。当时的禹作敏是全国著名的民企业家，有着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一类的头衔。我和我的同事政治觉悟有限，竟未识破他以后会堕落为罪犯，所以那些热烈的掌声是发自内心的。顺便插一句，我对这种风云人物一向是有自己判断的。这一点，以后我会谈到。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何以文化水平并不高，严肃地

说，讲话中还夹杂了不少低级趣味的这位农民企业家，一席话竟如此引起共鸣呢？我得出的结论是，他讲的都是大实话。也就是说，别人也想过，没有想通；或者想通了，遮遮掩掩不好意思说出口，结果被他说出来了。禹作敏一个老农民，又大红大紫，如此膨胀，可谓亦天亦地的一个人物了，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呢？

由此受到的启发，并不是说我敢于拉开脸面信口开河，而是说多谈一些至少在知识分子群中为人普遍关心的事情。讲到自己的学术活动时，少修饰、说实话。也许可以为读者提供一面镜子，照见自己，反思自己。或许这样能够赢得一部分实诚的读者。

写什么，是又一个犯愁的事。前面似乎已经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即与读者分享自己做了这些年经济学研究的心得，或者从更加宽泛的角度说，让自己和读者都看一看一个中年人是怎样走过一段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道路的。但筛选材料是十分艰难的，怎样去芜存精，把有价值的东西奉献给读者，需要认真对待。

绝对不敢企想如文化界的名人那样，讲自己的隐私，引读者上钩。何况，我们这种人本无太多隐私。要有，也都是在思想深处的。现在已经过了“斗私批修”的年代，允许人们保留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心里。我仍然愿意把可怜的一点点隐私留给自己。这一点请读者原谅。

钱钟书先生在与魔鬼谈话时，曾经专门向魔鬼“请

教”过怎样写自传。魔鬼对钱先生透露道：“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自传就是别传。”我不敢把本书作为自己的学术传记，但也对魔鬼的经验之谈颇感兴趣，因为我大概属于“并无自己可传”的那类人。

我自己不是名人，接触的名人也就有限，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素材，供我用别人的名气赚稿费。更何况在产权官司盛行的今天，讲别人太多了难免惹上麻烦。但魔鬼对我的启发是，我可以从自己所作研究的角度，描述在我的世界里，这二十年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甘愿冒点风险，放弃一部分读者，而只谈自己的读书、写作和思索，而且仅仅是在经济学的领域。

于是，我猜想，这本小书与我所写的更加专业化的东西之间，最大的区别应该是：第一，我只写我怎样得出那些专业文章和著作中的结论的，而不再赘述那些结论本身。不过，读者不必担心，我并不打算把经济学家惯用的论证过程和逻辑，强加给可能是非专业的读者。实际上，我认为，对于一些乐于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读者来说，我们更容易在更加一般化的思维方式上取得共鸣。

由于我的许多研究，是与其他人合作的结果，既然在这里要自述学术，当然就无法避免涉及到这些成果。一方面，我尽可能随时随地注明哪些工作是合作的；另一方